

士官生

Ю Н К Е Р А

俄罗斯文学经典



A. Kyrpa

[俄] 亚·伊·库普林 著
张巴喜 译



A. Kuprin



士官生

Ю Н К Е Р А

[俄] 亚·伊·库普林 著
张巴喜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士官生 / (俄) 库普林著; 张巴喜译.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07.3

ISBN 978-7-80225-251-6

I. 士... II. ①库... ②张... III. ①长篇小说—俄罗斯—现代②中篇小说—作品集—俄罗斯—现代 IV. 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7) 第038720号



士官生

[俄] 亚·伊·库普林 著 张巴喜 译

责任编辑: 罗 晨

封面设计: 孙 昊

责任印制: 韦 舰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67号隆基大厦 100005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65270477

传 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

经销电话: 010-65512133

邮购电话: 010-65276452

邮购地址: 北京市东四邮局7号信箱 100010

印 刷: 河北大厂彩虹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60×980 1/16

印 张: 32.5

版 次: 2007年4月第一版 2007年4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225-251-6

定 价: 42.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公司联系调换

“库普林的作品没有任何虚假的东西……”

“像亚·库普林这样的小说家，为什么会被拔高为当代俄罗斯文学的翘楚？

“……十九世纪末，俄罗斯文学开始了一个动荡、断裂和新的文学形式发展—巨变的过程。‘颓废主义’、‘印象派’、‘现代派’，尽管无一例外地缺乏节制，但它们在为新的主题创造全新的文学形式；无论如何，这类新主题往往都与‘日常生活’……都与统御俄罗斯文学的‘现实主义’（除了个别的例外）发生着断裂。我们且不说‘唯美主义者’，且不说‘神秘主义者’，只需指出契诃夫和高尔基的继承人——列·安德列耶夫就已足矣……与此同时，亚·库普林写作偶尔非常迷人的生活趣闻和故事，被视为过去的‘现实主义’最具天才的代言人之一……就这样，在广大公众的眼里，这个可爱的笑话讲述人和不坏的‘风俗题材艺术家’成长为第一流的明星。而这已经给他并且还会继续给他带来糟糕的影响……”^①

一九一二年，库普林在俄国享有巨大声誉的时候，老练而敏锐的批评家 P. B. 伊万诺夫—拉祖姆尼克这样写道。此外，他还预言道：“这一切公正与否，惟有到我们这个时代退为‘历史’之后，才会变得分明……”然而在给此文命名时，批评家却让无与伦比的想象力充当了主角。他的文章题为——《一时的哈里发》。

一九二〇年代中期，库普林本人在分析文学声望的奇迹时写道：

“俄国读者群——非常古怪的一些受众。它的底层极端热衷于

^① 伊万诺夫·拉祖姆尼克：《一时的哈里发（亚·库普林）》，《遗训》，彼得堡，1922年，66—67页。



《强盗邱尔金》^①、《凶犯马卡尔卡》^②、维尔比茨卡娅^③、别布托娃^④和耐特·平克顿^⑤。理智的……上层读者至今仍热衷于反复咀嚼《怎么办?》……

“但在俄国读者中有一个非常庞大却又难以捕捉的——睿智而独立的中层，他们只受健全的本能驱使，而且从不会错选或误评年轻的作者。”^⑥

下文中，库普林以他素有的绝对的朴直，作为被“广大读者”发现并推崇的作家，依次讲到了蒲宁、列昂尼德·安德列耶夫、苔菲^⑦的文学命运。其实可以认为，库普林也在字里行间准确而心怀感激地勾勒出了他本人的读者形象。

最令人惊异之处恰恰在于：在四分之三个世纪内，维尔比茨卡娅，《凶犯马卡尔卡》，“唯美主义者”，“神秘主义者”，还有长篇小说《怎么办?》，命运几度沉浮。而库普林——连同圣诞节故事《神医》（1908）和《乐手》（1910，二者作为近百年历史的《基辅论坛》、《敖德萨新闻》的圣诞节专号而在编辑桌上草草写就），库普林——连同自己的杂技艺人、走私贩子、巴拉克拉瓦渔夫和加特契纳的飞行员，连同大辅祭奥利姆比和警察分局长维特契纳，连同女骑师诺拉对身穿散发着护肤霜气息的斜纹衫的独角戏小丑、监督局小吏热尔特科夫对“有着可以在老插画中见到的迷人肩部曲线的公爵夫人”刻骨铭心的爱，库普林——连同“破坏性的”《决斗》（1905）和“保护性的”《士官生》（1932），连同大象托米、小猫尤尤和长毛猴亚什卡——始终是个被广为阅读的作家，一个深受爱戴的作家。

他大概与“新文学形式的发展”进程无关——因此也并未在文

① 报刊连载小说，作者为巴斯托霍夫。

② 报刊连载小说，作者为日沃托夫。

③ 维尔比茨卡娅（1861～1928），女作家，作品以描写女性爱情和自由为主，极为畅销。

④ 叶莲娜·别布托娃-库兹涅佐娃（1892～1970），女画家。

⑤ 耐特·平克顿（1819～1884），美国侦探。

⑥ 库普林：《阿维尔琴科和〈讽刺〉》，《库普林论文学》，库列绍夫编，明斯克，1969年，第110页。

⑦ 苔菲（1872～1952），俄国女作家，1920年代流亡，一个被长期低估的天才。



学史管理机构领取养老金。一九〇〇至一九一〇年代的采访人、报刊记者、“大众”的活跃信使，远比随笔作家们对他更感兴趣。而享有这种一直伴随库普林的、被“广大却难以捕捉的中间读者”关注的——还有蒲宁和高尔基、列宾和斯塔索夫、契诃夫和列夫·托尔斯泰。

“当他出现在《俄罗斯财富》之后，我立刻便对他充满期待。”^①蒲宁回忆道。一八九三年夏天，二十三岁的第聂伯第四十六步兵团上尉在《俄罗斯财富》发表了中篇小说《在黑暗中》。要想在这篇小说的作者身上预见到未来的库普林，《盗马贼》（1903）、《冈布利努斯》（1907）、《莱斯特律戈涅斯人》^②（1907）和《革出教门》（1913）的作者库普林——或许需要具有蒲宁一样的敏锐眼光。

一八九四年秋，库普林从军队退役。随后是在基辅、日托米尔、顿河-罗斯托夫的外省报纸充满磨难的艰苦工作的六年，在南俄罗斯“极度贫困和快乐青春中”游历的六年，广为人知的库普林式的辗转于各地与各种职业的六年。“我先后担任过军官、土地测量员、西瓜装卸员、搬砖工人、莫斯科肉店店员……做过巡林员，春秋季节在别墅区搬运家具，给马戏团当听差，从事下九流的演员行当……”

这份清单并不完全，在写作中篇小说《摩洛》（1896）期间他曾去钢厂做工，他种植过莫合烟，他还在波列斯克教区代任过诵经士——这些便是库普林严酷的学校。

有两点可以作为他出自于这所学校的证明。

“……他毫无节制地挥霍自己的健康、精力和才华，像个凡事都不在乎的人那样，天马行空地随处游荡……”

“我们交往初期最常在敖德萨相见，在这里，我见识过他怎样越堕越深，他或是在码头，或是在最下等的小饭店和啤酒馆消磨时光，他在最恐怖的房间过夜，他什么也不阅读，除了码头渔夫、马戏团的勇士和小丑，什么也不感兴趣……”^③ 这又是蒲宁的描述。

① 蒲宁：《库普林》，《九卷本文集》，第九卷，莫斯科，1967年，第394页。

② 古斯拉夫神话中，奥德修斯曾经遭遇到的食人巨人。传说这些巨人所在地即克里米亚的小城巴拉特拉瓦。

③ 蒲宁：《库普林》，《九卷本文集》，第九卷，莫斯科，1967年，第396-397页。



“……他在敖德萨的老朋友，律师安东·安东诺维奇·伯格莫列茨，一九〇二或一九〇三年给他讲述了一个老女人的故事，这个女人遭受着自己的儿子、体形魁梧的码头装卸工的折磨。库普林当天便在码头上寻到此人，一边饱以老拳，一边放出狠话，让对方发誓不再污辱自己的母亲。那老妇来伯格莫列茨家里向库普林道谢的时候，我见到了她。库普林像儿子一样，毕恭毕敬地接待了她，同时为了不让我们赞美自己的善行，客人走了之后，他说道：

“‘在南方，女人的气息可真是美妙：苦艾、洋甘菊、干矢车菊和——教堂的香味儿。’”^①

这是科尔内伊·丘科夫斯基所讲述的，几乎是在相同时期、相同处境下的库普林。

毫无疑问，《冈布利努斯》属于世纪初敖德萨“最低级的小饭店和啤酒馆”。

……一九〇〇年春，库普林在敖德萨结识了契诃夫，并把自己在基辅出版的小书《小品集》（1897）——封面绘有一个女士和一株棕榈树——送给了他（“非常胆怯”地，关于这一点，献辞也可以证明）。（“这些小品大多发表于一份外省大报的通俗文艺专栏，或为这类专栏而写”，彼得堡的批评家这样证实。他们说得不错。）一九〇一年夏天，库普林在雅尔塔一个贫苦的希腊人家租了个房间——并且应契诃夫的邀请，去他家里写作，艰难、缓慢、细心备至地工作。在契诃夫雅尔塔的家里，在“楼下餐厅旁”的房间，诞生了库普林第一篇真正的杰作——《在马戏团》（1901）。

几个月后，契诃夫简洁地告诉作者：“我荣幸地向您通报，列·尼·托尔斯泰读了您的小说《在马戏团》，他非常喜欢。”^②

一九〇三至一九〇九年间，库普林的作品经常在亚斯纳亚波梁纳得到阅读。库普林收入《小说集》第一卷（彼得堡，知识出版社，1903）中的《调查》（1894）——被视为（大概也有充分的根据）列·尼·托尔斯泰《舞会之后》这个短篇小说的来源之一。托尔斯泰喜欢《冈布利努斯》和《安宁日子》（1904）；《决斗》

① 丘科夫斯基：《同代人》，莫斯科，1967年，第191页。

② 契诃夫：三十卷本全集，《书信集》，第十卷，莫斯科，1981年，第177页。



引起他的强烈关注（“读它并不愉快。极其沉重。……一本可恶的书。写得极有天赋。”《战争与和平》的作者最终这样评判）。托尔斯泰后来的通信，以及同代人恭敬记录下来的谈话，都包含了对这个年轻人饶有兴趣且颇具好感的一系列零星的评价；托尔斯泰与他只有一面之缘，那是在一九〇二年六月，在雅尔塔“圣尼古拉号”轮船甲板上——他们的谈话也不过半小时。

“库普林在高尔基和安德列耶夫之上，”^① 托尔斯泰不止一次说过。“我最青睐库普林……他的小故事：《Allez!》（1897）、《在马戏团》、《夜岗》（1899）。”^② “库普林的作品没有任何虚假的东西。”^③ “我想起了库普林：过去的军官，如今在出版《神界》；听说他以前喜欢狂吃宴饮，是个大力士。”^④ “库普林没有任何主义，他就是一个军官。”^⑤

鉴于托尔斯泰奥林匹亚神似的远离一九〇〇年代的文学生活，他对库普林“军官身份”的垂青已被年轻些的同代人所注意。一九〇六年的一本讽刺杂志上，刊登了一幅署名列·米（列米佐夫）的生动漫画——托尔斯泰身穿克里米亚战争时期的炮兵军服，正在庄严地抚摸陆军上尉库普林的脑袋。

关于《决斗》的作者，在一九〇七年二月的亚斯纳亚波梁纳，还记录下这样一段引人关注的谈话：

“他还年轻……他大谈自由主义的时候力不从心；而在表达感情时则非常强大……”

《决斗》于一九〇五年五月问世。小说编入“知识社”同仁作家合集第六卷，并献给了高尔基。“如今彻底完成的时候，我可以说不，我小说中所有的勇敢和激烈之处都属于您。但愿您能知道，我从您那里学到了多少东西，我为此又多么感激您。”^⑥ 书籍出版之

① 马科维茨基：《在托尔斯泰身边。亚斯纳亚波梁纳笔记。1904～1910》，《文学遗产》，第九十卷，第一册，莫斯科，1979年，第426、428页。

② 同上，第274页。

③ 同上，第519页。

④ 同上，第424页。

⑤ 古谢夫：《日记。1907年10月29日》，《关于亚历山大·库普林》，萨文编选，奔萨，1995年，第56页。

⑥ 《库普林论文学》，明斯克，1969年，第221页。

日，库普林这样对高尔基说道，而该书出版日期几乎与对马海战及俄国海军溃败的时间重合。

一年之后，温格罗夫在为《布洛克加乌兹和耶夫隆百科全书》所作的《库普林》一文中，以学院派的严谨风格写道：“《决斗》在俄国图书业之所以取得空前成功，就在于它对于军队生活的描写迎合了一时最主要的兴趣。为俄国军队在满洲的一系列溃败所震惊的整个社会都在探究这场灾难的谜底。库普林的《小说》提供了一把钥匙……”^① 保守派的《莫斯科消息报》评论员一如评论高尔基的同路人那样，愤怒声讨“知识派”散文作家，说他们在自己的作品中，“把我们的人民一个阶层接一个阶层剔除出具有生存能力者的名单”^②。而守旧的《俄罗斯信使报》的文艺评论家则预言：“要知道，高尔基们和库普林们只是无产阶级春天的第一批燕子。要知道，这仅仅是些海燕。暴风雨还在前方。还会发现新的泥潭，具有独立见解的俄罗斯将在这些泥潭中毁灭殆尽。”^③

此外——还有最酷烈的反应。各种出版物的评论家们在谈到《决斗》时，都要拿库普林的《小说》与列·尼·托尔斯泰的《复活》，与契诃夫的《黑衣修士》和话剧《三姐妹》在不久前的一九〇一年的轰动相比（奇怪的是，他们把库普林的主人公和图金巴赫与维尔什宁相提并论，却一次也未提及索廖内依萨上尉），他们回忆起巴扎罗夫与巴维尔·彼得罗维奇·基尔萨诺夫的决斗以及迦尔洵写于巴尔干战争期间的小说。在《注定灭亡之人》一文中，库普林的好友巴丘什科夫把《决斗》里检阅这一场景同列宾的画作《国家代表大会》相比照。

在这一洞见后面——显现出小说的深层含义，而这似乎是日俄战争与一九〇五至一九〇七年革命时期的文学论争中未曾发现的内涵。就像列宾在画布上一样，库普林的《小说》描绘了复杂、强大、历经数代的，尚且宏大——但已经僵死的社会机制。失去价值基础，内含不复存在——形式也就随之轰然崩溃。在公民抗议“知识派人

① 温格罗夫：《布洛克加乌兹和耶夫隆百科全书》，第三卷（增补卷），圣彼得堡，1906年，第40-41页。

② 巴萨金：《文学对军队的攻击》，《莫斯科消息报》，1905年5月21日，第137期。

③ 斯基福：《报刊与文学评论》，《俄罗斯信使报》，1906年，第12期，第586页。



士”的背后，《决斗》的文字中透露出面对社会共同体即将消亡，或许还包括——对世界末日潜在的恐慌。年轻的库普林所爱戴的、颇具自传成分的罗马绍夫上尉不无缘由地苦苦思索，“空虚，巨大，冰冷……在上方……从大地直至苍穹，所有空间都充斥着永恒的恐惧和无尽的忧伤。”

罗马绍夫、团队和驻防部队的生活——不是这种感受的原因，从众所周知的意义上来说这是——结果。这种庞大无比的空虚——让宏大的帝国机器、军队、N步兵团和上尉所在六连的存在、过往和日常生活失去意义，因此，库普林的整部小说或许还可当做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个著名诘问的详细版本来读：“如果上帝已死，那在此之后，我究竟算什么大尉？”

过了四分之一世纪，在谈到库普林小说的存在主义意味，谈到《决斗》时，阿达莫维奇敏锐而准确地把它视为“俄国男孩儿们”“迷惘一代”的超前宣言。

一九〇五至一九〇七年间，批评家们不止一次地把库普林的小说与日耳曼中尉比利泽极其畅销的讽刺作品《一个小分队的生活》相提并论（此书译本一九〇四年出现在俄国图书市场）。但是，且不管库普林在创作小说时是否知道比利泽的作品，“《决斗》阶段”对库普林的创作生涯都不可或缺。而这个阶段过得也足够迅速。

“在柔弱的罗马绍夫身上，库普林倾注了自己的情感，”^①列·尼·托尔斯泰在阅读《决斗》时指出。库普林在字里行间融入了自己严酷而痛苦的青春体验，在把高尚的神经质的上尉不可挽回地推向死亡的过程中，他似乎也从自身剥离掉了某个替身，而目的则是与之告别。与此同时——他告别的，还有自己所承受的小说轰动所带来的诱惑。

“库普林的首部杰作——便是他的《决斗》。但在《决斗》中所读到的与其说是他，不如说是某个想象出来的俄国的比利泽。

“对一些人来说，小说在艺术上的缺憾是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

^① 马科维茨基：《在托尔斯泰身边。亚斯纳亚波梁纳笔记。1904~1910》，《文学遗产》，第九十卷，第一册，莫斯科，1979年，第425页。

而对于另外一些迫切希望拥有自己的比利泽的人，这正是比利泽，而不是库普林或是什么艺术家……一个严重的危险。而他作为一个艺术家，值得称道的是——顺利避开了这种危险。在他小说集的第三卷，再没有库普林 - 比利泽的影子。”^① 一九〇七年二月号的《天平》杂志指出。库普林站在了创作高峰期的门口——接下来的六七年，创作出了《冈布利努斯》、《莱斯特律戈涅斯人》、《婚礼》（1908）、《莲诺奇卡》（1910）、《家庭方式》（1910）、《石榴石手镯》（1910）、《旅行者》（1912）和《革出教门》。

“我迷恋英雄主义情节……”这个时期，库普林曾经说过，“所有读者——而尤其是俄国读者——似乎已经失掉信心（这是十九世纪文学的过错），认为英雄主义本色已经人间蒸发、枯竭、一去不复返了。我们开始认为，一个人应该死于穿堂风……不再相信友情和诺言，不再尊敬别人的女人，不再喜爱别人的孩子……”^② 一九一〇年代为数不多、但光彩照人的随笔中，库普林热情洋溢地写到吉卜林、杰克·伦敦、汉姆生和亚历山大·仲马，但他这个时期最杰出的中篇和短篇故事的主人公——却有另外的灵魂，另外的根基。《冈布利努斯》里的残疾乐师萨什卡英勇无畏；《石榴石手镯》中的小吏热尔特科夫和老将军阿诺索夫英勇无畏；基辅贫民窟复活节餐桌上的女主人、并未在自己贫苦、严酷、肮脏的生活中丧失人性的妓女索尼娅英勇无畏（《家庭方式》）；来自尤拉·巴拉吉诺合作组的那些莱斯特律戈涅斯渔夫（《莱斯特律戈涅斯人》），以及被不公正地遗忘了的迷人故事《穷王子》（1909）里那个逃离华丽却无趣的圣诞树、带着“厨娘孩子们”挨家唱祝歌的十岁的达尼亚英勇无畏；那个并未宣布把远离教堂的列夫·托尔斯泰逐出教门、而是祝他长寿安康的大辅祭奥利姆比英勇无畏（《革出教门》）。

这种文字世界，确切地说——这文字中的世界，英勇，乐观，充满绚烂的光彩与气息，透过对世界的爱与感恩——为世界本身的

① 阿尼奇科夫：《Allez！（论库普林的小说）》，《天平》杂志，1907年，第2期，第70页。

② 《库普林论文学》，第247页。



存在——的棱镜，那睁大的眼睛所见到的日常生活的快乐令人迷醉。这种爱，这种感激，似乎创造了库普林的风格：对生命的爱——是他洞察力的原初动因，是进行赞歌般描绘的激情，描绘秋天的海滨花园、海滨的渔民咖啡馆、小马驹依祖姆鲁特撒欢儿的青草地和古老莫斯科的小院，就在这小院，就在复活节之夜，小说《莲诺奇卡》里的武备学员和女中学生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亲吻。

而这一点正如所呈现的那样，与库普林由来已久、并在一九〇五年的笔记中所透露出的领悟力密切相关：惟有“自由的空气和迅猛的运动”能够医治契诃夫时期俄国散文中那一代矛盾、盲目、崇高、意志薄弱、沉迷于世界性颓废的主人公。

毋庸置疑，这便是——人类的暖意，以及“相信爱与承诺”、热爱别人孩子的能力。这在库普林的文字中毫无止境，既非反省的结果，也不是有意为之，而是不言自明、本身固有的。库普林的女主人公所呼唤的不是超人，而恰恰是人，他文学谱系中的人物并非源自吉卜林式的士兵与官员，源自杰克·伦敦的淘金者，源自戈兰中尉——他们大概源自库普林最挚爱的世界文学范围内的英雄，源于“猎人，酒徒，骑手，小地主，无政府主义者，异教徒，源自‘舒适且并无不快地散发着奇西里红酒^①、烟草和野兽气息的人’”^②——源自托尔斯泰的《哥萨克》中的叶罗什卡大叔。

“俄国人中蕴含着无数叶罗什卡的灵魂。”^③ 他曾对列宾写道。

很多证据表明，他热爱并在一篇文章中歌颂赞美过“狄更斯”，正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评价的那样，这位“所有作家中最具基督徒气质的作家”。他理解，“狄更斯笔下，这家常的、舒适的、宗法制的英格兰，它的家庭节日，它的驿道，它好客的小饭馆，它古老的法庭和事务所，它古朴淳厚的风俗和海风一样强健放诞的幽默，这一切都是那么的亲切迷人。”^④ 带着狄更斯式的暖意，狄更斯式的对

① 一种高加索红葡萄酒。

② 《库普林论文学》，第249页。

③ 同上，第250页。

④ 同上，第124页。

忠诚的宗法制家庭生活的热爱，狄更斯式的对“普通人”、对闪耀着生命之爱、回荡着铜茶壶的叮当声和灶膛边蟋蟀鸣叫声的日常生活进行隐秘颂扬的迷恋——库普林在一九〇〇至一九二〇年间的作品中，创造了一系列多姿多彩的正派人物——从警察分局长维特契纳（《旅行者》）到参谋部上校沃兹尼琴（《莲诺奇卡》），从公爵夫人、寄宿学校校长（《勇敢的逃亡者》1917）到掩护被宪兵追踪的“奥恰基”巡洋舰水手的邈邈女人依莲娜·普拉东诺夫娜（《毛毛虫》1918）。

“健康、明理、勤劳、强大的人”的形象变换着身份，一次又一次地在库普林的笔下诞生。他这个年代作品的主人公们伫立在散列的文学形象队伍之中，位于列斯科夫的正派人物和什梅廖夫的正派人物中间。库普林的小说仿佛一系列的素描和草图，仿佛一个虚拟画廊里的杰出肖像，这个画廊如狄更斯的那般详尽和宽广，如狄更斯一般——为一个民族提供了“家常的、舒适的、宗法制的”，但在任何意义上又是绝对真实的独具特色的形象。

这一主题在小说《所罗门星》（1917）中得到了完美体现。库普林的主人公，小办事员伊万·斯捷潘诺维奇·茨韦特，住在五层楼顶的复折式阁楼，在窗台上用板条箱种植旱金莲、木樨草、桂竹香、矮牵牛和香豌豆，他喜欢就着番红花甜面包圈喝杯加炼乳的咖啡，喜欢特罗伊茨冰场、谢肉节集市和淌凌期，他为补贴家用，用纸、箔、金银绦带和绸缎边角料剪剪贴贴，制作糖果盒和圣诞节枞树饰品，而在节假日——去一家名为“白天鹅”的地下室小酒馆，跟邮政局、宗教事务所、警察局、收容院的小官吏们一起演唱“古老的俄罗斯民歌，小俄罗斯歌曲，特别是《多瑙河外的扎波罗热人》选曲，但更常见的是——风格肃穆的教会音乐”。伊万·斯捷潘诺维奇的最大梦想是——得到十四品官衔，能戴上在他的抽屉柜底层抽屉中放了很久的、配着墨绿色丝绒帽檐的制帽。

这种用温暖醇厚、浓墨重彩的笔调描画的安闲日子突如其来地中断了：猜出了在先知魔法书中发现的密码之后，小办事员得以驾驭名为梅菲斯托费里的魔鬼（值得一提的是，布尔加科夫的长篇小说《大师和玛格丽特》的若干篇章明显带有库普林这篇几乎被遗忘



的小说的影响^①)。茨韦特的所有愿望都能实现,可他出于对无所不能的恐惧,拒绝了魔鬼的礼物。“您幸运的是,您这个人心灵那么善良,还那么……请您不要生气,我亲爱的……还那么……怎么能说得委婉一些呢……单纯幼稚。处在您的位置,恶棍可以让整个地球血流成河、火光冲天。智者要努力把它变成极乐世界,但他自己也将悲惨而痛苦地殉葬。您避免了这两种可能……”温顺的魔鬼在把心地纯良的主人公送回阁楼,赋予他十四品文官头衔,与他告别时说道。

库普林把这个简单的观念,把这种亲切到放肆程度的生活哲学提交给读者来评判的时间是——一九一七年春天。

值得一提的是,也就是在这种历史语境下,他因为“颂扬小人物以及小人物的市侩利益”而遭到了谴责。

一九一七年五月,库普林与新闻人比利斯基一道,开始编辑《自由俄罗斯报》。几乎在每一期的“图书”专栏都载有库普林“恶毒”的杂文,以及记录二月革命后,俄国“现实变迁”的迅速、简洁、鲜明的特写。顺便说一句,该报只维持了不到三个月。

然而,当出版人瓦西里耶夫斯基(涅-布克瓦)创办《言论报》的时候,库普林连同塔诺姆-伯格拉兹、穆伊热利、阿维尔琴科、苔菲、阿格尼弗采夫、丘科夫斯基,成为该报固定的作者。《言论报》(它既是《言论早报》,又是《彼得格勒回声报》和《纪元报》)生存到一九一八年五月,其间经历过革命法庭的七次查封、四次审判——又重新以各种名字复刊。

库普林一九一七年发表在《自由俄罗斯报》上的政论,还有文章中对书呆子气的空谈家乌里扬诺夫的冷静分析,对祖国的拯救者——克伦斯基寄予的颂歌般的希望,对沙皇制度的牺牲者、对那些“为自由这个神圣而幸福的口号、几乎在我们目睹下死去的同代人和战士们浸透鲜血的荐亡人名单”^②的沉痛议论,这一切在一九一八年的报纸上都让位给另外一种热情,另外一种观察,另外一些文字。他

① 基谢列娃,彼得罗夫斯基:《基辅作家:库普林和布尔加科夫》,虹出版社,基辅,1988年,第124-132页。

② 库普林:《焦糊味儿弥漫》,《自由俄罗斯报》,1917年5月17日,第8期。

出版纪实小册子和草就的乱世纪事。他竭力挽救特鲁别茨基设计的亚历山大三世纪念碑免遭毁灭，恭敬地请求“有觉悟的同志们”从海军部大厦前的普尔热瓦里斯基的青铜塑像上除去肩章，请求“一位同志原封不动地保留骆驼”^①，他在一九一八年七月描写了对将领们实施的枪杀^②，他思考教育问题，颇具前瞻性地呼吁：“……危及学校的不只是无知这种瘟疫，还有党派侦缉和扼杀持异议的教师的危险以及洗衣女工般的无所不能的恣意妄为。而这一切，当然都是打着新的革命教育的旗号。”^③作为药方——库普林建议家长们从“旧人”中合伙雇用教师，按学校的大纲在家里教育孩子（用他的话说，就像从前犹太人居民区的犹太家庭所做的那样）。

一九一八年六月，如自己所确信的，从此不再是个君主主义者的库普林（照列·尼·托尔斯泰的准确定义，“仅仅是个军官”，带着自己朴素而坚定的人格准则毕业于莫斯科第二武备中学）发表了《米哈伊尔·亚历山德洛维奇》^④一文。大概他是惟一高声疾呼保护沙皇的弟弟米哈伊尔公爵的人。而理由——绝对是库普林式的：米哈伊尔·亚历山德洛维奇——一个优秀的指挥官，亲王的野战师随时可以证明这一点。除此之外——他热爱孩子、马匹和狗。

库普林这篇文章的背景——首次郑重而带有保留意见地宣布沙皇一家被处死于叶卡捷琳堡的消息。

结果是——十四天的拘捕。根据 K. A. 库普林娜^⑤的回忆，她和作家的妻子 E. M. 库普林娜曾被告知，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被枪毙了。

库普林在特写《轰动事件》^⑥中记录了这次拘押。

“……任何时候，政权都不应该因为不自觉地参与谋杀、偶然地纵容强暴行为、麻痹地窝藏罪犯而让自己蒙羞。

“那些杀害申加廖夫、科科什金……无数神职人员、将军、军

① 库普林：《古迹》，《言论晚报》，1918年4月18日，第23期。

② 库普林：《三次死亡》，《言论报》，1918年6月20日，第8期。

③ 库普林：《合伙》，《言论报》，1918年6月20日，第13期。

④ 库普林：《米哈伊尔·亚历山德洛维奇》，《言论报》，1918年6月22日，第15期。

⑤ 库普林的女儿。

⑥ 库普林：《轰动事件》，《纪元报》，1918年，第4期。



官和其他人的凶手，此刻你们在哪里？

“……他们命令那些饿得奄奄一息、失血眩晕的人，带着小丑尖帽、傻瓜铃铛和夜间焰火去参加‘五一’节游行……”^①这些话写于一九一八年。

在一九一九年十月，尤登尼奇的军队开进了库普林和他全家居住的加特契纳。库普林出现在了城市警备司令部——而出来的时候，他已经成了战地报纸《涅瓦河流域》的编辑。这份报纸的寿命不到一个月。

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初，库普林随西北军撤离城市……大约在十年之后，他在中篇小说《圣伊萨基·达尔玛茨基尖顶》（1928）中描述了这希望和绝望交集的几周。

库普林一九二〇年上半年为《新俄罗斯生活报》写于赫尔辛福斯的一些小品，则是这篇小说的素材和草稿。

这些小品形态各异——从陀思妥耶夫斯基和赫尔岑式的评述与预言，到不足报纸四分之一版的短文《图申上尉们》——没有这篇文章，似乎就无法想象库普林从《调查》、《决斗》到《圣伊萨基·达尔玛茨基尖顶》和长篇小说《士官生》的创作轨迹。除了这篇不长的文章，库普林或许从未在任何地方如此坦率而充分地表达过个人的价值体系和人格准则。

人格准则好像还促使库普林为《新俄罗斯生活报》写下了最后一篇小品。在随笔《蔬菜栽培》中，最著名的俄国作家之一详尽、清晰、认真地向仓皇的俄国难民讲解，怎么给胡萝卜松土，怎么整理白菜畦，怎么架豌豆，怎么掐黄瓜叶。没有任何隐喻，没有一个形动词短语。只有种植自己园地——在巴拉克拉瓦，在日托米尔，在加特契纳——的多年经验^②。

一九二〇年六月二十六日，库普林带着妻子和女儿离开赫尔辛福斯。七月四日抵达巴黎。

他一九一七至一九二〇年间的报刊文章有五十多篇，至今未被

① 库普林：《万恶》，《彼得格勒回声报》，1918年5月12日，第68期。

② 库普林：《蔬菜栽培》，《新俄罗斯生活报》，1920年5月1、20、22日，第6、112、113期。



收集，实际上也不为当代读者所知。

关于库普林的流亡生活，曾有很多人记述。大概没有哪位俄罗斯大作家如此沉痛地体验过与祖国的别离。蒲宁笔下匆匆而过、却又刻画犀利的库普林的晚年肖像广为人知，并被频繁征引，却很难不再次转述：“……我有一次在街上碰见他，心中一惊：丝毫看不出昔日库普林的影子！他捋着可怜的小碎步，慢吞吞地走着，那么消瘦羸弱，好像风一起就能把他吹倒似的，他没能立刻认出我来，随后，他抱住我，那么感动和温情，那么悲伤而柔顺，让我热泪盈眶。还有一回，我收到他两三行字的明信片——非常荒唐地遗漏掉了个别字母的字迹那么大、那么抖，就像是个小孩儿写的……”^①

作家在失去祖国的同时，还失去了滋养他创作的源泉，这一点——已经成了老生常谈。但这个通行的观点却很少得到文学史的支持。在任何情况下，大多数最具名望的俄国作家——蒲宁、什梅廖夫、格奥尔基·伊万诺夫和其他很多人——恰恰是在那里，在国外，写出了自己最好的作品。或许只有谈到库普林时才会说，流亡期间他浪费了自己大部分的艺术才华。但这种说法似乎显得牵强。这个时期的作品中，曾经以自己的威力让同代人震惊的“血肉之声”变得有些喑哑，但与此同时，库普林的散文语言却变得越发澄净和……抒情。其中仍然保留着那种对鲜活生命的敏感，但这个世界呈现得却没有那么分明了，要透过记忆的雾霭才得以看清。因此，晚期佳作中的库普林（这里所说的也不单单是《士官生》和《扎涅塔》〔1933〕，还包括其他作品）与创作旺盛期的库普林不分伯仲。他不过是稍有变化而已。

有关读者怎样接受作家的“暮年”之作，保留下来格奥尔基·阿达莫维奇的重要证言：“在我们这里，库普林曾经非常受人爱戴——而且现在仍然如此：好像甚至都超过了任何一位他的同龄人。不管乍看上去这有多么奇怪，即使在最后的岁月，当他天赋上的疲态变得明显时，对他的喜爱也在增强。”如果要给出一个谈论流亡期间的库普林写作弱点的理由——那就是，他作品的命运取决

^① 蒲宁：《库普林》，《六卷本蒲宁文集》，第六卷，莫斯科，1988年，第256页。